

阿乙：尋找寫作新出路 黎明終會到來



《早上九點叫我》



《灰故事》



阿乙講座後為讀者簽書。

當代小說家阿乙，他的作品疑幻似真，情感卻寫實。他在寫故事，也是在寫人物的性格和氣質。當中國鄉村的性質轉變，當鄉村中他認為有性格有特點的人物消失，鄉村的文學舞台坍塌，他便開始尋找寫作的新出路，這個過程或許曲折，或許要經歷黎明前的漫長黑暗，但他堅信黎明終會到來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今年的香港書展已過去兩月有餘，但對阿乙的印象卻始終清晰，他安靜且不擅言辭，答問時卻句句誠懇。他在講座中談「鄉村和農人的消失」，這是他近年所關心和不斷重複提起的話題，而他看待這種消失也如流水般自然。

詩意地種花養魚，有錢的村民花幾十萬建新房，卻是出於憂慮和不安的本性，「有個安定的落腳地總是好的，若是死了，棺材總不能停在別人家門口，或者有一天外星人入侵，城市不安全了呢？」無論是對他還是對已外遷的村民，鄉村存在的意義只是為了送葬，送別人，最終也送自己。

描繪鄉村農民的轉變

阿乙提到，賈平凹、閻連科和莫言等作家代表了中國鄉村寫作的高峰，他們筆下的農民有着很重的二十世紀的味道，而自己在小說中所描繪的則是對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農民的寫照，「這個時代的農民和前一代有着本質的區別，他們已經完全市場經濟化了，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，轉變為對致富概念的重視及以錢為動機而耕作，而我的小說正是講述在這種背景下所產生的故事。」他今年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《早上九點叫我》正是寫了一場喧鬧的鄉村葬禮，其中也提到大家對遺產分配的重視程度已遠遠超過對葬禮本身，禮崩樂壞。

他表示，現時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已被簡化，對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尊重不復當年，取而代之的卻是對金錢和權力的崇拜。「中國有九成的寫作者還處於掙扎的狀態之中，即使是在世界範圍內來看，也只有少數作家可以將作品兌換為貨幣和影響力，通過寫作而衣食無憂，財政自由。而港台因為讀者基數少，我相信這裡的作家通過寫作謀生是更困難的事情。」

長篇之後開拓新領地

《早上九點叫我》也許是阿乙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，不僅是他對過去鄉村經驗的大規模徵用，也是巨大精神力的凝結，前後耗時五年，全程投入兩年，他坦言：

「對我來說，完成一部長篇小說，無論是前期準備、寫作還是後期修改，都需要很長的時間，我不再有那樣字斟句酌的體能。我寫長篇和短篇時用的是同一種方式，同樣這也是一種代價很高的方式，有時夢到某個場景會立刻起身拿筆記下來，日夜顛倒，一切為寫作讓步，付出了健康的代價，其實這也是一種不懂自控的表現。」他也透露，自己始終有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夢想，「一不小心」就實現了，「其實這篇動筆時是當做短篇來寫，寫着寫着發現寫不完，成了中篇依然寫不完，最終寫成為了長篇。」

在這之後，他不再着筆寫鄉村，「這部長篇小說傾注了我這些年所有的鄉村經驗，但鄉村的文學舞台已坍塌，而新的舞台還沒有建好，這幾年我也在嘗試摸索一條新的道路，可能是因果報應，鬼怪或詭異，恐怖或懸疑，在其中找到趣味，卻信心不足，不夠樂觀。」他甚至開始憂慮，當AI大數據成功統計了讀者喜好甚或開始寫作時，作為作家的自己會不會失業？直到最近他才找到鼓勵，放下了一部分開闢新道路的文學負擔，決定隨心而寫，一些趣味小故事由此誕生，出版新故事集的計劃同樣在路上，如同第一本書《灰故事》一樣，這也是他尋找新出路的過渡期，是「黎明前的黑暗」，而黎明終會到來。

寫作無分疆界和局限

阿乙原名艾國柱，1976年生，江西瑞昌人，曾當過警察和編輯，現專事寫作。他出版過小說集《灰故事》、《鳥，看見我了》、《春天在哪裡》；單行本《下面，我該幹些什麼》、《模範青年》；隨筆集《寡人》、《陽光猛烈，萬物顯形》等。他曾獲《人民文

學》的中篇小說獎及年度青年作家獎，第十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，第二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等。

讀阿乙的小說，總是能感到一種「儀式感」，用他的話說，是文字的「排場」要做得足，也許有些晦澀難懂，因為他總是賦予文字和段落太多的功能——承擔情節推動，描寫人物性格，顯現人物特徵，「沒有一句話是白白無故地出現，甚至有些用力過猛。」他始終認為，文學沒有疆界和局限性，不應過度談優劣。只要每日堅持寫，不必在意條條框框，時間久了，自然知道文學的尺度在哪裡。

社會在重新洗牌，是好了壞還需專家解釋，作為一個寫作者，他只是講述自己所看到的，人的遭遇。對他來說，寫故鄉的故事可以隨心所欲，信手拈來，正因為投入過真情實感，使他可以很快掌握那些人的心理脈絡。而在網絡小說興起的年代，他並不擔心自己的小說會過時，雖然背景設定在鄉村，但聚攏還是在人性和戲劇衝突，「先鋒和老土的界定在於思想，在我看來，先鋒是『誠實』，『偽善』則是老土，是徒然的廢話和不存在的虛假感情。」他說。



「鄉村和農人的消失」是阿乙近年所關心和不斷重複提起的話題。

製衣工廠在港難生存？ 羅正杰：改變產品目標客戶群或有轉機

香港曾是全球紡織製衣業舉足輕重的地區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製衣工人曾高達數十萬。但近十多年，隨著本港製衣的成本上升，令大部分的成衣生產商把其工序遷移至內地及東南亞地區。現今香港以金融服務及旅遊業為首，在本地要找到一間大型的製衣工廠已相對困難，甚至有人會認為香港製衣業已死。但對於羅氏集團而言，毛衫製造及紡織製造仍是集團的重要架構之一。

羅氏集團創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集團旗下品牌有bread n butter、Ztampz等。羅氏集團作為香港製衣業的龍頭之一，面對香港行業轉型，未有放棄集團製衣的部分。「香港對製衣業來說十分重要，依然是不少製衣公司重要的地區。」羅氏集團行政總裁羅正杰道。十分注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他，日前更出席了可持續時裝業會議「時尚高峰」的小組研討會，當中以「可持續時裝的演變」為題作講座分享，以提高公眾對時裝業和製衣業在可持續發展上的認知。羅更表示，去

年集團訂立了一套持續十五年的「企業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計劃」，「我們集團以往在教育方面投資了很多，因為我們相信教育可長遠地幫助國家發展，但我們在2016年起便在集團計劃上加入可持續的概念，而可持續發展是可做到雙贏的局面，公司在這方面做得好，也可以幫助到客戶，這也是個循環，令公司、客戶也有好處。」

有條件成港版「東大門」

羅氏集團已屹立香港近半世紀，集團以紡織成衣起家。隨香港的製衣成本上升，集團亦把其製衣工廠遷移至內地、越南、孟加拉等地區，香港則以交易、管理人才為主。羅正杰作為第三代後人，在現今的製衣行業上，他認為要十分清楚了解客戶的需求，也要與時並進，「我認為要有個世界觀，要清楚客戶需求是什麼，例如一些大的品牌往往需要大量生產才有成本效益，我們都會配合客戶，以提供客戶所需的产品，同樣客戶都

需要找一間供應穩定、有信譽的供應製造商，所以在我們的角度來說，絕對不會覺得製衣不能做。」

大量本港的製衣工廠遷移，至今仍在港運作的大型製衣工廠可算是寥寥可數，難道香港已不適合製衣工廠生存？對此，羅正杰則表示，只要能發展以香港客戶為目標的品牌，在港經營製衣工廠，也未嘗不可，「可能有一些新品牌的目標客戶只做香港地區，那將來就可能有『前舖後居』，或有小型的廠房可回來香港經營，生產出一些獨特的產品，可以成功的，但產品市場不大，因為香港人口不多，關鍵在於品牌如何去做，我覺得所有事必須以品牌先行，創立品牌後若那營銷模式可行的話，那其他後面的供應鏈，就會跟着品牌去運作。」他又以韓國東大門成衣製造基地為例，更指出香港也有類似條件可仿效，「韓國東大門那裡也是做完衣服設計後，不消兩日就可出貨，原因是附近有成衣製造生產基地，因此很快就可以出

貨，其實香港也有這個條件，特別是在深水埗這個地區，無論是布匹還是飾品，這些製衣所需的材料那裡都有。」

機械難以完全取代人手

隨着科技的進步，集團在製衣工廠中亦投資了各類型的機械，以提高生產效率。羅正杰說：「例如以前製衣要『剪飛仔』去記錄每個工人的生產數量，現在就轉換了加入拍卡系統方便計算工人的生產數量，很多工序也自動化了，所以整體的投資會比以前高了。」

為配合可持續發展，羅氏集團亦把工廠內的縫紉機升級，以伺服摩打取代舊有的離合摩打，新型的縫紉機一年最多更可節省七成半用電量，以減少碳排放。製衣除電量的消耗外，也會排放出大量污水，有見及此，集團更增設廢水處理及循環



羅正杰現任羅氏集團行政總裁。

劉國權攝



羅正杰表示，難以用機械完全取代人手製作衣服。受訪者提供



製衣工廠中的新型縫紉機。受訪者提供



羅正杰認為，現今的製衣行業要了解客戶的需求，也要與時並進。劉國權攝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